

# 浙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背景、展望与对策

编者按 若干迹象表明,浙江经济已经进入平稳的高速增长阶段。大多数学者认为浙江经济已经进入新旧转换的发展阶段,有的学者认为浙江经济已经形成内生增长的机制。研究这一经济体有别于其他省份的发展特征,探索发展新阶段的背景、原因、前景以及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已是学者及官员们当前关注的焦点问题。由此,本刊于2002年10月下旬就上述问题召开了一次小型研讨会,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此处刊发部分研讨文章,以供进一步研究探讨。

## 浙江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与区域经济重构

赵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客观地来分析,按照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衡量,浙江经济整体上当已完成了“起飞”,正处在“向成熟过渡”的阶段,而城市以及临近大城市的城郊区域则大约处在“大众高额消费阶段”,至于像杭州、宁波等大都市,则不乏进入“追求生活质量”的区域与群体。但是,由于浙江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作为转型与发展经济所具有的独特特点,简单地套用发展经济学的某些概念、范畴来分析、判断其发展阶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要更客观、准确地判断浙江经济发展阶段与趋向,以及下一步面临的主要问题,必须更多地借助实证研究方法。

从实证研究角度来看,浙江经济的确处在某种新旧阶段转换过程中,转换的标志当不少于三个:

第一个标志表现在产业结构演进轨迹上,即“二产化”高潮的结束与“三产化”高潮的迭起。我们知道,直至目前,浙江经济总体上仍然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的经历表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之产业结构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强烈的“去掉农业”或“非初级产业化”特征,即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primary industry,也称“初级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非农产业比重则持续上升。但非农产业的上升,具体又由两个阶段构成,

分别为“二产化”阶段和“三产化”阶段。前者以第二产业在总产值中份额的持续上升为标志,后者则以第三产业比重的持续上升为标志。如若分析浙江的三次产业GDR(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变化轨迹,不仅可以明显看到这两个阶段的转换,而且还可以大体上确定这两个阶段的转换分界时点,即1998年。在那之前的20年间,浙江产业结构变化呈现强烈的“二产化”倾向:“二产”增加值在GDP中的份额由43.3%上升到54.3%,在那之后,“二产”比重不再上升,开始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三产”的异军突起:到2001年,“二产”比重已下降为51.3%，“三产”比重则上升到38.4%,创历史最高记录。按照发展的趋势,今后若干年,“三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直至超过一、二两个产业的总和。这一点已经为所有工业化国家先前的经历所证明,当一个经济完成工业化时,“三产”无论在国民产值中,还是在就业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

第二个标志表现在开放模式的转换上,由片面的国际化开放向区际化、国际化开放并重模式转换。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但一个大国内部之具体区域经济的开放,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面对国内其他地区的开放,另一种

是面对其他国家的开放。前一种开放可以称之为“区际化”，后一种开放可以称之为“国际化”。客观地来分析，浙江经济在市场导向转型的前 20 年间，开放重心几乎完全置于区际一边，浙江制造业发展的市场、要素绝大部分从区际开放中获得。这一模式的形成，部分地得益于具有“闯市场”偏好的浙江商人的首创精神与开拓精神，部分地则属于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由于早期浙江国际开放政策相对于沿海多数地区的不利处境，地区经济国际化开放受限，不得不另觅蹊径。结果便是超常规发展的经济区际化。短短的十多年时间，浙江商人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市场，形成了一个以浙江为核心的庞大的商品销售与要素吸纳兼具的市场系统，正是有这样一个系统，使浙江经济利用区际贸易、区际要素流动获得了国际贸易与国际要素流动一样的利益。这一点可以解释浙江经济转型前 20 年的“两低一高”现象：低外贸依存度、低外资依存度与高经济增长率。但有充分的迹象表明，这种模式近年以来也在发生转换，转换的开端也以 1998 年前后为界限。在那之前，浙江外贸、外资发展缓慢，在那之后则双双突进。由此而引起两个依存度的大幅度上升，尤以外贸依存度上升最快：1998 年之前，浙江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 GDP 百分比）最高年份也只有 25.4%，出口依存度（出口占 GDP 比重）则不高于 18%，而到了 2001 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上升到 40.5% 和 28.4%。短短三年时间，前者上升了 15 个多百分点，后者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上升之快为沿海地区之最！与此同时，浙江商人在“走出去”方面也跃跃欲试，开始积极进军海外市场，进行创办中国式跨国企业的尝试。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作为区域经济的浙江经济，其开放模式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换。

第三个标志可以从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上看到，是城市化的加速。虽然城市化有许多指标，但人口的农村—城市向的空间迁移是个基本指标。最近三四年以来，浙江人口的空间迁移变化有两个鲜明的倾向：一个是农村人口迁居城市加速，另一个是小城市迁居大城市加速。前一个加速的标志是城市化率的加速上升，近四年以来每年的增幅都在 2 个百分点左右，2001 年更高达 2.3 个百分点。在后一个加速中，人们对于大城市的选择已经超出省域范围，浙江人主要是那些“先富起来”的浙江商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在浙江省内寻找居住与发展的城市了，而将眼光放宽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海外。

上述三个标志，不仅意味着浙江经济发展正在经历某种阶段转换，而且还非常清楚地显现出这种转换的基本方向。具体来说，产业结构变化“二产化”的过去与“三产化”的继起，预示着浙江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收尾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量将由“二产”向“三产”移动。“三产”的主导行业，如金融、保险、通讯、贸易、运输等等，将迅速上升为“现代经济”的龙头产业，制造业将要永远失去在整个产业中“龙头老大”的地位，它只有依托第三

产业的上述主导行业才能得到进一步扩展；区域经济开放模式的转换即从片面区际化到区际化、国际化并重模式的转换，预示着浙江经济市场与要素流动空间分布的变化，国际市场、国际资本以及外向投资对于浙江经济的下一步发展，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打破省域界限的都市化的加速，意味着投资因而经济空间分布的调整开始。所有这三个方面的转换，都正在或即将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在所有的挑战中，一个挑战最值得关注，这个挑战与一种效应联系在一起，这便是“城市化—老板进城与迁移效应”。

表面上看来，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人们定居区域空间的变化，即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事实上在这个现象的背后，主导因素是“老板进城”倾向。这一倾向在浙江显得尤其突出，其影响尤其深远。我一直感到，浙江最近 20 多年以来的工业化，是欧洲古典工业化在转型经济的现代翻版：发端于乡村而成长于城市，集聚于小城市而完成于大都市；主要由私人企业家、商人推动。而私营企业家、商人等这些被笼统地称为“老板”的群体举动，正在影响乃至左右着浙江工业化的进程，赋予浙江区域工业化以某种独特的特点。城市化也不利外。今天的浙江老板们 20 多年前几乎全是农民，在创业初期，略有积蓄，翻修一下农村的老房子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后来随着其实业的扩大，财富的积累，在家乡盖个小楼，购置较现代化的设施也感到不错，再后来就是在县城乃至地级中心城市买个商品房，迁移户口进城。进一步发展，随着老板们财富的进一步积累，他们经营的实业与远地乃至国际市场联系的经常化与扩大化，“老板们”对小城市的人居与发展环境渐渐失去兴趣，开始寻找适合现代人居住与发展的城市，主要是大城市。目前相当一部分浙江老板，带有这种行为倾向。由此而正在发生如下连锁效应：老板要进城，主要是大城市，投资要流动，跟随老板流动，企业要迁移，跟随投资移动，最后则是打工者进城。这是古典城市化的典型版本，也在成为浙江城市化的版本。

我认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浙江的老板群体是最好流动的，因此投资也最容易流动，区域间经济的融和在微观层次最为活跃。微观层次的区域经济融和必然引致经济区域间布局的重构，其中三个层次的区域经济重构将是大势所趋：第一个层次是长江三角洲两省一市之间的经济重构，主要是主体产业重构；第二个层次是浙江省内部几大区块之间的经济重构；第三个层次是省内县域经济的重构。在这三个层次的经济尤其是产业重构过程中，最大的压力将落在县域经济身上，说明白一点，有些目前繁荣的县域，一旦在区域经济重构中失势，将可能衰落下去，而那些生气勃勃的新兴县域，则可能集聚新的产业，成为次级制造业中心或区域商贸中心。

上述区域经济的重构，当是浙江各级政府应对的最大挑战之所在。